“赵树理方向”的历史节点与是非曲直

——赵树理评价问题研究之一

赵 勇

【作者简介】赵勇，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原文出处】《文艺争鸣》(长春),2021.9.16～25

赵树理自称其作品为“问题小说”，其实他本人也是“问题人物”，因为自从作为作家的赵树理诞生以来，对他的评价与定位就反反复复，颇让学界头疼。例如，洪子诚虽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专列“赵树理‘评价史’”一小节内容，但他只是简要梳理一番“评价史”中的各路观点，却并未对赵树理其人其作进行定评。很显然，他也在“文学界对于赵树理的评价有些犹豫不定”[①]的行列之中。《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面世十年后，他虽撰写了《文学史中的柳青和赵树理(1949-1970)》(《文艺争鸣》2018年第1期)，也提供了如何评价赵树理的更多史料，但“犹豫不定”似未得到彻底解决。

那么，又该如何走出“犹豫不定”的泥沼呢?我以为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重返历史现场，知人论世，在人与文、人品与文品、人格与文格之间对赵树理进行全面考察，不能“见物不见人”。倘若取此视角，我们就会发现，在赵树理走上文坛之后二十余年的所作所为中，同时也在七十多年的“赵树理评价史”中，应该存在一个从“赵树理方向”到“赵树理精神”的位移过程。把这条位移的曲线搞清楚，或许有助于对赵树理的进一步评价和定位。

但囿于篇幅，我在此文中只能对“赵树理方向”的来龙去脉、反反复复和是是非非做一番梳理和分析。

一

众所周知，“赵树理方向”原本是一个具有“号召”功能的官方说法，也是主流意识形态为赵树理量身定做的一个标签。

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1943年)一炮打响后，紧接着又有两篇重量级的小说《李有才板话》(1943年)和《李家庄的变迁》(1945年)先后面世，于是惊动了当时数位具有官方身份(或色彩)的大牌作家和评论家，他们在1946年纷纷撰文，对赵树理的创作实绩予以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比如，郭沫若读《李有才板话》，说“我是完全被陶醉了，被那新颖、健康、朴素的内容与手法”，[②]然后，“我又一口气把《李家庄的变迁》读完了”。[③]茅盾当年也撰文两篇，认为《李家庄的变迁》“用一句话来品评，就是已经做到了大众化。没有浮泛的堆砌，没有纤巧的雕琢，质朴而醇厚是这部书技巧方面值得称道的成功。这是走向民族形式的一个里程碑，解放区以外的作者们足资借鉴”。[④]当然，文章写得最长、评价也最全面的是周扬的《论赵树理的创作》，他一方面指出赵树理是“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另一方面，又把赵树理纳入毛泽东延安《讲话》的阐释框架中，认为他的成功“正是实践了毛泽东同志文艺方向的结果”，其作品是“文艺座谈会”以后“文学创作上的一个重要收获，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⑤]所有这些，既是对赵树理创作的最初评价，同时也为提出“赵树理方向”做出了强有力的铺垫。

于是1947年，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召开为期十六天(7月25日-8月10日)的文艺座谈会，集思广益之后提出“赵树理方向”，也就变得顺理成章了。当时的《人民日报》(晋冀鲁豫)随后报道这次会议时指出：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大会首先讨论赵树理创作。在讨论过程中,大家实事求是地研究作品,并参考郭沫若、茅盾、周扬等对赵树理创作的评论及赵树理创作过程、创作方法的自述,反复热烈讨论,最后获得一致意见,认为赵树理的创作精神及其成果,实应为边区文艺工作者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具体方向。"⑥当然,更重要的是《人民日报》(1947年8月10日)同时刊发的陈荒煤的那篇宏文——《向赵树理方向迈进》。此文进一步明确:"大家都同意提出赵树理方向,作为边区文艺界开展创作运动的一个号召!"然后强调了向赵树理学习的三点内容:"第一,赵树理同志的作品政治性是很强的。""第二,赵树理同志的创作是选择了活在群众口头上的语言,创造了生动活泼的、为广大群众所欢迎的民族新形式。""第三,赵树理同志从事文学创作,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具有高度的革命功利主义,和长期埋头苦干、实事求是的精神。"⑦实际上,这三点也是对"赵树理方向"的最初理解和官方解读。迟至1983年,陈荒煤虽对这一号召有所反省,并认为"如果用'赵树理的创作方向'可能更准确一些",但他主要还是强调了这一号召的合理性、正确性和感召力:"老赵实际是一个具体实践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为工农兵服务方向的标兵,提'赵树理方向'比较鲜明、具体、容易理解,所以最后还是以这个篇名发表了文章。""'向赵树理方向迈进'这个号召,对当时晋冀鲁豫的文艺创作的确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⑧

必须指出,赵树理之所以在1947年能被树为标兵,"赵树理方向"之所以能被提炼出来并成为号召,除赵树理提供了故事、人物、语言均焕然一新的小说文本并确实使人感到耳目一新外,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它们与毛泽东《讲话》精神的高度契合。陈文特别指出:赵树理自己总结的"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这两句话是毛主席文艺方针最本质的认识……赵树理同志的创作就是最朴素,最具体的实践了毛主席的文艺方针,因此他获得如此光辉的成就"!⑨回到当年的历史语境之中,这样的"对位解读"应该说相当准确,并无夸大不实之词,因为当赵树理初读(1943年冬天)《讲话》之后,曾如此表达过自己的激动心情:"我那时虽然还没见过毛主席,可是我觉得毛主席是那么了解我,说出了我心里想要说的话。十几年来,我和爱好文艺的熟人们争论的,但是始终没有得到人们同意的问题,在《讲话》中成了提倡的、合法的东西了。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⑩"以为自己是先得毛主席之心的,以为毛主席讲话批准了自己的写作之路。"⑪这就意味着"赵树理方向"与《讲话》精神的契合不仅是一种客观事实,也是赵树理在《小二黑结婚》之后主动追求出来的一种结果。同时也需要指出,从一开始起,"赵树理方向"就是一个政治意义大于文学意义的公共事件,它虽然也必须假道于文学阐释,却只是置于政治意识形态的阐释框架中才具有合理合法性。

然而,"向赵树理方向迈进"毕竟不同于"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⑫同时,"赵树理方向"也并非死者谥号,而是对生者的一种美誉,这就意味着只要赵树理活着,所谓的"方向"就处在未完成状态,他必须用其后续作品进一步夯实并引领这个"方向"。或者也可以说,"赵树理方向"虽然水到渠成,应运而生,也在特定的历史场域中发挥了"号召"作用,但是对于赵树理本人来说,该"方向"却也成了某种"负担"。而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实表明,赵树理果然为这个"方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于是有必要指出赵树理研究中我无法认同的一种观点。李扬教授认为,"赵树理方向"只是"昙花一现",因为在1949年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赵树理跻身于大会主席团中,其创作也被做大会报告的周扬推崇备至。但在四年之后的全国第二次文代会开幕式上,"赵树理的明星色彩已消退殆尽,几个重要的报告都不曾提到他的名字。赵树理的'黄金时代'几乎才刚刚开始就已经结束了"。而他衰落的重要标志则是1951年落选于斯大林文学奖。何以如此?因为不仅是赵树理,也包括"发明"赵树理与《讲话》关系的周扬在内,他们对《讲话》的理解都过于简单,而没能像郭沫若那样在"经与权"的辩证法框架中予以解读,这样,赵树理就既"永不可能触摸到《讲话》真实的灵魂",也很难写出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暴风骤雨》)那种"伟大"的作品了。⑬

这种观点是很值得专文辨析一番的。我在这里只想指出的是,赵树理的衰落以及"赵树理方向"的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淡出，其实经历了一个反反复复的过程，而并非昙花一现。于是，回到以往的历史语境之中，对这个过程的历史节点和相关“大事”做简要梳理，就有了某种必要。

二

“赵树理方向”提出后的1948年，赵树理便有《邪不压正》面世，随后《人民日报》分两次(1948年12月21日和1949年1月16日)刊发六篇讨论文章，其中多为肯定与褒扬之语，但也有批评之声(党自强：《〈邪不压正〉读后感》)。于是一年之后，赵树理亦在《人民日报》(1950年1月15日)撰文回应，直陈其写作意图是“想写出当时当地土改全部过程中的各种经验教训，使土改中的干部和群众读了知所趋避”。而在此文末尾，赵树理还打了个比方，以此表明他对批评的态度，亦为自己的小说委婉辩护：“比方一件棉衣，一个裁缝批评起来，往往是说胸前的棉花厚了些，或下摆宽了些……这些意见没有一条不值得重视。如果发现人家确实说得对，下次就能做得更好一点，然而却不能因此就断定那件棉衣根本要不得或者不合适，等到穿棉衣的穿上去，你问他怎样，他如果只说不好挺胸脯或者腰松一点，那就还马马虎虎能穿，如果他说穿不上或者说穿上很凉快，那就算吹到底了。”[14]这一事件表明，“赵树理方向”并非护身符，而赵树理对它的首次夯实之举就引来麻烦，恰恰意味着树大招风，成为“方向型”作家本身就很麻烦。而赵树理的回应不卑不亢，有理有节，还不忘来一番赵氏幽默，又意味着写什么和怎样写还没有对他构成多大困扰。可以说，那时的他正处在一个“自信时刻”，批评宛如毛毛雨，是不大可能给他带来多少实质性的影响的。

现在看来，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前后确为赵树理的“高光时刻”。1949年4月赵树理进京后，先是出席《文艺报》主办的第三次座谈会(6月8日)，随后又在《人民日报》(6月26日)首次发表创作谈《也算经验》，接着出席文代会(7月2日-19日)，并在文代会前夕试刊的《文艺报》(6月30日出版)发表祝贺短文《会师前后》，排在胡风(《团结起来，更前进!——代祝词》、叶圣陶(《划时代》)之后。而作为会议代表，赵树理在“平津第一代表团”中名列第六(因名单每行列五人，又是竖排版，他的名字也正好与排名第一的周扬比肩而立)。[15]周扬则在所做的大会报告中进一步强调：“反映农村斗争的最杰出的作品，也是解放区文艺的代表之作，是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随后他用近400字的篇幅，阐述了为什么赵树理的作品“艺术性和思想性取得了较高的结合”。[16]会议结束时，赵树理被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87名正式委员之一，名列第八(他前面的七位委员分别是郭沫若、丁玲、茅盾、周扬、曹禺、沙可夫、古元)，[17]随即又被选为常务委员。会议期间，工人出版社成立，赵树理出任社长。9月25日，《文艺报》正式创刊，赵树理成为该刊编委。10月1日，他在观礼台上参加了开国大典。随后，又参与创建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并被选为主席；与丁玲等一行15人出访苏联，参加十月革命纪念活动；同时，也开始担任文化部戏剧改进局曲艺处处长。[18]很显然，赵树理进京之后的各种“待遇”和“安排”，应该都是“赵树理方向”辉光影响之下的产物。然而，随着《说说唱唱》的创刊(1950年1月)并担任主编之一(另一主编是李伯钊)，赵树理也迎来了自己的“检讨时刻”。

经赵树理同意，《说说唱唱》第三至四期连载了孟淑池的中篇小说《金锁》，却正好撞到了枪口上。1950年4月19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文艺报》立刻跟进，在当年第5期刊发社论文章：《加强文学艺术工作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文中点了《金锁》的名，并把它归入“主题思想不正确，人物形象被歪曲”一类作品。同期特意开设“批评与检讨”栏目，其中有批评文章(邓友梅的《评〈金锁〉》)，讨论文章(陶君起整理的《读了〈金锁〉以后》)，还有赵树理的检讨文章(《〈金锁〉发表前后》)。有趣的是，为使批评话语更为准确，邓文中还不时插入了编者旁白。例如，“作者在这里是歪曲了金锁这个人的(不如说：歪曲了劳动人民的性格。——编者)”而赵树理既有“自我检讨”，也有“一点辩护”：“读者意见中，有一条是说这篇作品中的主角金锁是不真实的，是对劳动人民的侮辱。我以为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这是不对的。”[19]然而，两个月后，他不得不在《文艺报》(第8期)上再次检讨，明确了“侮辱劳动人民”之说“大家是对的，我是错误的”。[20]而至1951年冬，在开展整风学习的过程中，《北京文艺》被合并到《说说唱唱》中，老舍出任主编，赵树理降为三位副主编之一。接着，赵树理发表《我与〈说说唱唱〉》，同时刊发于《光明日报》(1952年1月19日)和《说说唱唱》(1952年1月号)，等于是对自己的“糊涂想法”(如模糊阶级面貌)和“由要求‘形式通俗化’走到了‘形式主义’”来了一个总检讨。[21]但即便如此，《文艺报》依然没放过《说说唱唱》，因为该报后来又刊发长文，对《说说唱唱》调整后的五期审而读之，批而判之，认为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上看，“五期以来的《说说唱唱》还没有能负起它所应当负起的任务；它还落后于‘发表优秀通俗文学作品和指导全国通俗文艺工作的刊物’的应有水平，而且缺乏明确的战斗目标”。[22]

《说说唱唱》创刊时，《文艺报》是为这份刊物做过广告的，[23]但为什么后来它却揪住赵树理和《说说唱唱》不放呢?我们当然可以理解为这是当时的大环境使然，却也不应该忘记其中的个人恩怨。而由于彼时丁玲担任《文艺报》第一主编，她又是最早投奔延安，再加上她的傲气以及她与周扬早已形成的矛盾，她就不可能把“方向型”作家赵树理放在眼里。许广平曾经揭发，丁玲“对赵树理同志很看不起”，并曾一再对人说过：“为什么老把赵树理压我头上。”[24]邢小群访谈朱靖华时曾提出过如下问题：“我听说她对巴金、赵树理、老舍也不大放在眼里。”朱靖华说：“她是有这些现象的。说起赵树理，也说‘啊，他很好啊’，口气有点像对她的晚辈。但是说起郭沫若，郭老啊!口气就不一样了，特别崇敬。郭沫若来时，她一定要陪着的……赵树理、老舍、胡风，是我们来陪。”[25]丁玲生于1904年，赵树理是1906年生人，他们当然是同辈作家，但是由于赵树理与周扬的关系，也由于“检讨事件”正好发生在“东、西总布胡同之争”初起阶段，于是丁玲乘“批评与自我批评”之东风，借机批评《说说唱唱》，和赵树理，让他与刊物同时陷入困境，也应该是极有可能的。

于是，有必要谈及“东、西总布胡同之争”与赵树理在“斯大林文学奖”中的落选。现在看来，“东、西总布胡同之争”既可以形象化地看作“面包与窝头之争”，也可以实名化为“丁玲与赵树理之争”。但实际上，文学观念之争只是其表，藏在背后的个人恩怨和力量博弈才是其里。这样，赵树理的“落选时刻”也就不能简单用“衰落”概括得那么轻巧。种种资料表明，周扬对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有成见的，其证据是，该小说1948年完稿后，丁玲曾复写一份，请时任华北局宣传部副部长的周扬过目把关，但周扬看过后既不退还，也不提意见，却把“微词”传到了彭真等人那里。于是丁玲向周扬要回书稿，复给胡乔木、艾思奇、陈伯达等人审读。得到他们的肯定，尤其是得到毛泽东的默许后，此小说才迅速在东北出版。[26]而从此开始，丁玲也与周扬结下了梁子。囿于这种“成见”，报“斯大林文学奖”时，周扬(时为中宣部副部长)的必然是“抑丁扬赵”，不可能让胡乔木推举的作品锦上添花；而西总布胡同这边报的也确实是赵树理(据说是《李有才板话》)，但最终却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作品胜出。于是“双方对立情绪剧烈。弄到各自组织人写文章，要在报上公开批评。在此情况下，周扬召集了东西总布胡同会议，双方各有5人参加……周扬在会上说：‘今天参加会议的，都是共产党员吧?不能再这样搞门户之见了，以后你们东总布胡同不要批判赵树理，西总布胡同不要批判丁玲，谁要批评这两位同志，都得经我批准。’”[27]为什么周扬这样做?应该是迫于某种来头更大的压力。有资料表明，参评之初周扬并未报送《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苏联方面问起此事，当时在苏联养病的任弼时便发话了：“那书写得不错嘛，不能十全十美，可以送去参加评选。”[28]这个细节值得注意，因为任弼时是中共元老之一，他在关键时说话，还是很有分量的。再加上毛泽东对丁玲的认可，这是不是也会成为周扬报奖时考虑的一个因素?

于是，有研究者指出：“相对于农民出身的赵树理而言，她的来头相当大。虽然赵树理本人无意于拉帮结派，但由于他受到了周扬的赏识，因此自然成了周扬一派。周扬和胡乔木之间的竞争，周扬和丁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玲、冯雪峰之间的个人恩怨，迫使赵树理和丁玲在无形中成为文艺上的宿敌。”[29]我以为这是持平之论。因此，赵树理最终无缘于“斯大林文学奖”，并不能证明“赵树理方向”已然衰落，而只能说明此时的丁玲风头更健。与她相比，赵树理戏称自己的所谓“通天彻地”[30]就有点小巫见大巫了。当然，也必须承认，在当时的“斗争”语境中，《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既把“群众性的暴力”描写成“革命的狂欢节”和“阶级斗争的极致”，也意味着一种“新的美学原则”已经崛起。[31]它们更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或许也更符合“斯大林文学奖”的评奖要求。

在第二次全国文代会(1953年)上，做大会报告的周扬和茅盾确实未曾提及赵树理的名字，但主要原因或许是赵树理在此四年间只写了一个短篇小说《登记》，而并未像被点名的柳青、徐光耀、杨朔等人那样写出过《铜墙铁壁》《平原烈火》《三千里江山》之类的大作品。但即便如此，周扬在回应“解放区的文艺到了城市能吃得开吗?”“解放区的文艺作品是什么‘农民文艺’?”时也严正指出：“这实际上就是表现了对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的动摇。”“说这些话的人实际上是瞧不起为工农兵的文艺的。他们的意见是不能代表人民群众的。”[32]说话听声，锣鼓听音，这番言辞更像是为“赵树理方向”所做的辩护之词。而当赵树理写出长篇小说《三里湾》(1955年)之后，其人其作则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扩大)”上受到了比较隆重的对待。周扬在大会报告的第三部分首先谈论的就是《三里湾》，他认为此小说是“优秀成果”，因为“作者以他特有的关于农村的丰富知识，热情和幽默，真实地描写了农村中社会主义先进力量和落后力量之间的斗争，农民在生产关系、家庭关系和恋爱关系上的种种矛盾冲突，显示了农村新生活的风光……作者所描写的那位画了三里湾三幅画的画家老梁不正是作者自己的影子吗?作者热爱农民，也深知农民作为小生产者的弱点，他在批判农民落后的时候，就往往流露出亲切的温和的微笑。”[33]尽管周扬也指出了此小说所存在的问题(如矛盾解决得比较容易，许多情节没有充分展开等)，但可以看出他的欣喜是溢于言表的。于是，在这一报告的后面，他形成了这样一个断语：“作家茅盾、老舍、巴金、曹禺、赵树理都是当代语言艺术的大师。”[34]而康濯也在大会补充报告中盛赞赵树理，认为《三里湾》“无疑是近年来描写当前农村生活的一部优秀的长篇”，是二十部中长篇中“最受欢迎的一部”。[35]

有必要对此语境稍作分析。进京后的头几年，赵树理应该是在紧张、忙碌、充实而又比较惶恐的生活中度过的。一方面，他在第一次文代会之后拥有了一大堆头衔——全国文联常务委员、全国文协常务委员、中国曲艺改进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戏曲改进会委员、《文艺报》《小说选刊》编委、工人出版社社长、《说说唱唱》主编等，于是开会、出访、作报告、编刊物等事务性工作便占据了他的大部分时间；另一方面，以后的写作之路该怎么走、进城之后是否要面向他不熟悉的工人生活，也成了他主要考虑的事情。他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发言时说：“我的‘文化水’是落后的，‘文学水’似乎高一点儿，但那只是一般老前辈拖的捧的。‘政治水’稍好一点儿，但还需提高。‘社会水’呢，我是家庭农业大学毕业，不过对乡村还不能说是太熟悉，进到城市以后对工人更是生疏。”[36]这番自白语极谦逊，应该是赵树理真实的心理写照，也恰与进京后不断提倡“一本书主义”且因此趾高气扬的丁玲形成对比。然而，社会活动多，必然挤占写作时间；城市生活不熟悉，又无从在此处下手；[37]好不容易“赶任务”写出篇《登记》，还不被领导同志看好。于是便有了赵树理所谓的“入部读书”(1951年)：“胡乔木同志批评我写的东西不大(没有接触重大题材)、不深，写不出振奋人心的作品来，要我读一些借鉴性作品，并亲自为我选定了苏联及其他国家的作品五六本，要我解除一切工作尽心来读。我把他选给我的书读完，他便要我下乡，说我自入京以后，事也没有做好，把体验生活也误了，如不下去体会群众新的生活脉搏，凭以前对农村的老印象，是仍不能写出好东西来的。”[38]原《工人日报》社长章容也曾回忆：“刚进城一段，老赵未拿出好作品，周扬同志很为他着急。大约在1953年，在周扬同志家里召开一次会，请丁玲、康濯、苗培时和我等为老赵写不出好作品找原因。周扬同志还为老赵开了个外国名著书目。不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久，老赵又写出了《三里湾》。”[39]

胡乔木与周扬一前一后都如此“关照”赵树理，为其开书目，劝其下农村，这一细节其实是很耐人寻味的。考虑到胡与周的关系，所谓的“入部读书”便不应该理解得过于简单甚至书生气十足，以为这就“颠覆了之前文艺界对赵树理的肯定”，以致“‘赵树理方向’显然是一个有待重新评价的方向”。[40]表面上看，胡乔木确实是在“帮”赵树理，但在当时的语境中，把它理解为这是他的“项庄舞剑”手笔，似更显得合理——表面上是“帮”，实际上是“批”；“批”了赵树理，也就达到了变相“批评”周扬的目的。而在周扬这里，他的“着急”则应该是真着急，因为赵树理是他一手树起来的写作标兵，赵树理若是黔驴技穷，写不出像样东西，这让他情何以堪?而对于赵树理来说，无论是胡乔木的变相敲打，还是周扬的正面帮教，应该都给他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因此，《三里湾》的面世，除去它是第一部有关农业合作化题材的长篇小说，具有捷足先登的政治意义外，显然还有其更为特殊的附加意义：于赵树理而言，这是一次证明自己“进城之后”依然宝刀不老的“起霸”之作；对周扬来说，这又是为他挣回面子让他不至于尴尬的“有面”之作。如此一来，他在作协理事会上高调表扬赵树理也就更显得意味深长，那固然是就事论事，但又何尝不是对“赵树理方向”的合理维护和含蓄捍卫?他的潜台词很可能是这样的：你们瞧，赵树理的作品依然能够“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我们树起来的“标兵”哪里会那么弱不禁风?

于是，赵树理也迎来了自己的“‘翻身’时刻”。

三

在我对“赵树理现象”的关注中，1950年之后的赵树理虽一路坎坷，已不可能像1949年时那样了，但一直到1956年，他都谈不上怎样衰落。这也意味着“赵树理方向”至少在文坛上持续十年左右甚至更长的时间。当时写出《平原烈火》(1951年)的青年作家徐光耀后来说过：“过去，我佩服的作家第一是赵树理，第二是孙犁，第三是萧也牧。”[41]而尽管当时的沈从文已隐身文坛之外，但他一直“暗中”关注赵树理并对他多有“腹诽”也是事实，于是他1952年重读《李家庄的变迁》，1956年读《三里湾》，1967年还在说“四川学沙汀，山西学赵树理，湖南学周立波，取法乎中，斯得其下，这哪会出人才”?[42]这两个事例一正一反，似都可说明赵树理当年的感召作用和影响力。而在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建国十年来优秀创作”书系中，精装1.45元的《三里湾》不但赫然在目，而且在《文艺报》的封底推荐中被排在16部长篇小说之首。[43]此外，还应该提及第三次全国文代会(1960年)。这次会议依然是周扬做大会报告，他在第二部分内容谈及“不少优秀的作品对我国人民的革命历史和现实斗争做了广泛的描绘和艺术概括”时，首先列举小说，赵树理的两部作品《灵泉洞》(排第四)和《三里湾》(排第九)均被提及，虽然它们没有进入到周扬的点评环节(点评的对象主要是塑造出来的“先进人物”，如朱老忠、沈振新、杨子荣、梁生宝等)，但赵树理也受到了应有的礼遇。[44]这至少说明，尽管1959年冬天赵树理因右倾错误挨整被批，但在周扬眼里，赵树理这杆旗并未倒下。如果给出“倒下”的确切时间，那应该是1964年的八九月间。彼时，“大连会议”“中间人物论”和邵荃麟成为批判对象，赵树理自然也难逃干系，他已不可能受到周扬的“保护”了。1965年2月，赵树理举家离京，回到山西，这一举动自然不宜被过度阐释，却也不免会让人产生联想：“赵树理方向”确实已到偃旗息鼓的时候了。

于是，把《三里湾》面世以及随之而来的相关荣耀看作赵树理写作的一次回光返照，进而看作“赵树理方向”的余音袅袅并从此走向“淡出时刻”，似显得更为合理。这是因为一方面，此后赵树理已无重量级作品面世——《灵泉洞》(1958年)只写了上部，《“锻炼锻炼”》(1958年)甫一面世就饱受争议；另一方面，丁玲虽然已被打倒，但李准的《李双双小传》(1959年)、柳青的《创业史》(1960年)等后起之秀已冲杀出来，他们笔下的人物(如李双双、梁生宝)也更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新人(先进人物)的要求。赵树理在“文革”被批斗时为自己辩护说：“我这个名气是从解放区出去的，进了北京虽然写了《三里湾》，后来名倒不如以前了。”[45]这是实情，也是他在新的“竞争”对手面前落败的结果。而当浩然的《艳阳天》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1964年-1966年)面世后,赵树理就更应该失落了。因为在"文革"之初,他读过《欧阳海之歌》(1965年)之后曾如此感慨:"这些新人新书给我的启发是我已经了解不了新人,再没有从事写作的资格了。"[46]很显然,在"向左走"的历史语境中,"长江后浪推前浪"的频率只会显得更快。

而在"赵树理方向"淡出之际,"赵树理精神"也开始潜滋暗长。如果必须给出一个这种精神生成的时间点,我倾向于1956年。为什么如此?这正是我下一篇文章要面对的问题。这里我不得不对"赵树理方向"稍做总结。

首先需要进一步强调,"赵树理方向"是延安《讲话》的产物,是被"解放区政治"构建出来的一种文学方案。这也注定了它与《讲话》的从属关系:《讲话》是"源","赵树理方向"是"流";前者是文艺理论建构,后者是文学话语实践。其实,这一点周扬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的报告中已讲得非常清楚:"毛主席的'文艺座谈会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47]而在第三次全国文代会上,周扬又进一步明确:"自从1942年毛泽东同志发表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来,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一直成为我国革命文艺工作者所拥护、所遵循而为之奋斗的坚定不移的方向。"[48]很显然,只有《讲话》才是铁打的"方向",而"赵树理方向"只不过是这一总方向下的派生物。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毛泽东《讲话》只是总纲,实际上它又被1949年之后不断出台的新"讲话"所充实,从而使原来的内容不断扩充,也使文艺为政治、为工农兵服务的任务更加明确和具体化。在原来的《讲话》语境中,赵树理是信心满满的,他也配合得恰到好处,"赵树理方向"遂与《讲话》高度吻合;然而在新的"讲话"语境中,赵树理虽然也一直处在"紧跟"状态,却渐渐力不从心、进退失据了,于是"赵树理方向"也渐与"讲话"渐生距离。这样,"赵树理方向"的崛起、衰落和逐渐淡出,就必须在毛泽东唯一《讲话》与其各类"讲话"的互动中寻找答案,而不宜只拿《讲话》做文章说事。

周扬是"赵树理方向"的实际提出者,同时也是这一"方向"始终不渝的捍卫者。现在看来,他对此"方向"的坚持与捍卫应该包含着更丰富也更复杂的信息,任何一边倒的解读恐怕都失之偏颇。这是因为第一,周扬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文艺路线的忠实执行者,"赵树理方向"则是在这种路线背景下被总结出来的一个重要法宝,因此,坚持与捍卫这种"方向"是政治需要,也能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一种政治正确性。第二,在实际执行和运作的过程中,"赵树理方向"又成了周扬的一个政绩。无论赵树理给力还是不给力,他都必须以他当时的地位和权威把这个"方向"顶着撑起来。第三,周扬毕竟是懂行的文艺中人,而并非单单是政治中人,于是"赵树理方向"也倾注了他个人的文学感情,暗含着他对赵树理为人为文的欣赏。渡尽劫波之后,周扬在1980年曾经说过:赵树理"文如其人,他文好人也好,文章有特色,人也有特色。他最熟悉农村,最了解农民心理;他懂世故,但又像农民一样纯朴;他憨直又机智诙谐;他有独到之见,也有偏激之词;他的才华不外露,而是像藏在深处的珠宝一样不时闪烁出耀眼的光芒。我喜爱他的为人,甚至对他的某些偏见,也能谅解"。[49]这是他处在反省和"道歉"阶段的表白,应该是真心实意之言。如此看来,在周扬这里,"赵树理方向"于公于私,至少被注入了三种东西。它们之间的互助互动,构成了周扬维护它的主要动力。

对于赵树理本人来说,"赵树理方向"让他既受益又受累。据陈荒煤讲,1947年形成《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一文后,他曾请赵树理看过,赵树理则一再提出:"我不过是为农民说几句真话,也像我多次讲的,只希望摆个地摊,去夺取农村封建文化阵地,没有做出多大成绩,提'方向'实在太高了,无论如何不提为好。"[50]但这个政治性大于文学性的称号他实际上是拒绝不掉的。而因为这个称号,他也确实暴得大名,引领了一段时代潮流,及至成了文学史中的一个著名现象。然而,也是因为这个称号,他就不得不时时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处在一种按图索骥的写作状态中。因此，他比别的作家更疲累的地方在于，除了要为宽泛意义上的工农兵服务之外，他还要为更具体的“赵树理方向”服务。但吊诡的是，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赵树理方向”仿佛已成“测不准定理”，赵树理在紧追慢赶深落实中实际上常常跑偏，到后来，恐怕连他自己也弄不清楚以他命名的“方向”指向哪里了。而“方向型”作家终于“方向感”失灵，关键在于“向左走”一路高歌猛进，他却步履迟缓，走走停停，而且进入“矛盾时刻”。

走笔至此，我想特别指出一个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的特殊氛围中，无论是戴光中的“逆流说”还是郑波光的“迁就说”，其实都是对“赵树理方向”和赵树理关系的一种简单化处理。“赵树理方向”固然对赵树理构成了某种限制，但因此就认为“新中国成立前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新中国成立后的《创业史》《红旗谱》《山乡巨变》《铁木前传》等大大地前进到赵树理前头，包括马烽的《我的第一个上级》、西戎的《赖大嫂》，在典型形象的塑造上，也走到了赵树理的前头，唯独赵树理本人，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观念基本上处于僵化状态，在艺术上他完全无意也无力自我超越”。[51]这种观点既缺少“了解之同情”，也是线性历史观的产物。批评者大概不懂得马克斯·韦伯所讲的那个道理：文学艺术不同于学术，是不存在进步与落后之分的。“一件真正‘完满’的作品，永远不会被别的作品超越，它永远不会过时。”[52]而时至今日，我们似乎已能心平气和地说，赵树理的小说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创业史》等作品相比，其认识价值与美学价值显然要更胜一筹，这恰恰得益于他那种“僵化”的文学观，落后的“民间文学正统论”。[53]他在“赵树理方向”之下的困惑、迷惘以及呈现于小说文本之中的“晚期风格”，散见于小说文本之外的“谏言”之词，恰恰成全了赵树理的丰富和深刻。与之相比，其他与时俱进的作家反而显得有些“小儿科”了。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在评价“赵树理方向”下的赵树理时必须注意的一个方面。

2021年3月13日

注释：

①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9页。

②郭沫若：《〈板话〉及其他》，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第154页。

③郭沫若：《读了〈李家庄的变迁〉》，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第167页。

④茅盾：《论赵树理的小说》，见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第173页。

⑤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见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第156页、第166页。

⑥⑩⑱董大中：《赵树理年谱》，北岳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295页，第234页，第337页、第340-341页。

⑦⑨陈荒煤：《向赵树理方向迈进》，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第174-177页，第177页。

⑧荒煤：《向赵树理的创作方向迈进》，陈荒煤等：《赵树理研究文集》(上卷)，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137-138页。

⑪赵树理：《我的第二次检查》，《赵树理全集》(第六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458页。

⑫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8页。

⑬李扬：《“赵树理方向”与〈讲话〉的历史辩证法》，《文学评论》2015年第4期。

⑭赵树理：《关于〈邪不压正〉》，《赵树理全集》(第三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370页、第372页。

⑮参见董大中：《赵树理年谱》，北岳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330-333页；《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代表名单》，《文艺报》1949年第9期。

⑯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在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年版，第73页，第76页。

⑰参见《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名单》，《文艺报》1949年第12期。

⑲赵树理：《〈金锁〉发表前后》，《文艺报》第二卷第五期，1950年5月25日出版。

⑳赵树理：《对〈金锁〉问题的再检讨》，《文艺报》第二卷第八期，1950年7月10日出版。

㉑参见赵树理：《我与〈说说唱唱〉》，《赵树理全集》(第四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12-114页。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㉒陈聪:《提高通俗文艺刊物的质量——评北京文艺刊物调整后的〈说说唱唱〉》,《文艺报》1952年第9号。

㉓《文艺报》第一卷第九期(1950年1月25日出版)的封底整版刊登了《说说唱唱》的相关信息,有主编姓名,创刊号要目,"欢迎订阅"中的出版周期,定价额度等,同时附有对该刊的介绍文字:"《说说唱唱》是通俗的、大众的、综合性的文艺月刊。每期六万字到八万字。内容有评话、小说、快板唱词,都是咱们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各种文艺形式。散文能'说',韵文能'唱';认识字的看得懂,不识字的,说说唱唱听得懂,愿意听。它的对象:是城市里的工人、市民、大中学生;乡村里的区村干部、小学教员;部队里的中下级干部、文化干事;城市和乡村里千千万万的戏曲、曲艺工作者。"此段文字很有可能是出自赵树理之手。

㉔㉕许广平:《关于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活动》,《人民日报》1957年9月14日。转引自张霖:《赵树理与通俗文艺改造运动》(1930-1955),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50页,第172页。

㉖参见邢小群:《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77-79页;钱理群:《1948:天地玄黄》,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92-195页。

㉗苏春生:《从通俗文化研究会到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兼及东西总布胡同之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2期。

㉘㊶邢小群:《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79页,第162页。

㉙张霖:《赵树理与通俗文艺改造运动》(1930-1955),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51页。

㉚㊳㊻赵树理:《回忆历史 认识自己》,《赵树理全集》第六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472页,第468页,第482-483页。

㉛参见钱理群:《1948:天地玄黄》,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05页。

㉜周扬:《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文艺报》1953年第19号。

㉝㉞周扬:《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扩大)上的报告》,《文艺报》1956年第五、六号。

㉟康濯:《关于两年来反映当前农村生活的小说——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扩大)上的补充报告》,《文艺报》1956年第五、六号。

㊱赵树理:《我的水平与宏愿——在全国文代会上的发言》,《赵树理全集》第三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353页。

㊲赵树理确实动过写工人、写城市题材的念头,却无果而终。他说:"到了北京之后,我曾担任过一点地方性工作。在这期间,我也曾想就地熟悉一些地方情况,把北京作为我新根据地,可是略一试验,便觉得写作上的根据地不那么容易创造。不易办到的事,多加努力自然也可以成功,不过我觉着放弃一个自己已经熟悉的地方,再去熟悉一个不太容易熟悉的地方,事倍功半,无大必要,因此才又决定下乡。"赵树理:《下乡杂忆》,收录于《赵树理全集》(第五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368页。

㊴李士德:《赵树理忆念录》,长春出版社,1990年版,第87页。

㊵魏巍:《通过"柳青现象"反观"赵树理方向"》,《当代文坛》2016年第3期。

㊷参见《沈从文全集》,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9卷,第296页;第20卷,第97页;第22卷,第39页。

㊸参见《文艺报》1960年第2期封底介绍。

㊹㊾参见周扬:《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1960年7月22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文艺报》1960年第13-14期。

㊺赵树理:《在批斗会上的辩护》,董大中主编:《赵树理全集》第5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429页。

㊼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在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收录于《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年版,第70页。

㊽周扬:《〈赵树理文集〉序》,陈荒煤等:《赵树理研究文集》(上卷),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30页。

㊿荒煤:《向赵树理的创作方向迈进》,陈荒煤等:《赵树理研究文集》(上卷),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137页。

51郑波光:《接受美学与"赵树理方向"——赵树理艺术迁就的悲剧》,陈荒煤等:《赵树理研究文集》(上卷),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235页。

52[德]韦伯:《学术与政治》,钱永祥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5-166页。

53"民间文学正统论"是戴光中批评"赵树理方向"的一个主要内容,他说:"赵树理的小说,尤其是中后期作品,常常使富有教养的艺术家微笑摇头,被精于鉴赏的审美家视为'小儿科',已很难再在读者心中激起长久的兴趣。"戴光中:《关于"赵树理方向"的再认识》,陆梅林、盛同主编:《新时期文艺论争辑要》(下册),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第1784页。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